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文库
教授文集系列

THE END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Social Cost and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农民工的终结

基于社会成本与城镇化背景的考察

刘成斌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文库

教授文集系列

农民工的终结

基于社会成本与城镇化背景的考察

THE END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Social Cost and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刘成斌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民工的终结：基于社会成本与城镇化背景的考察 /
刘成斌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1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文库·教授文集系列)

ISBN 978 - 7 - 5201 - 1699 - 2

I. ①农… II. ①刘… III. ①民工 - 城市化 - 研究 -
中国 IV. ①D4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7725 号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文库·教授文集系列

农民工的终结

——基于社会成本与城镇化背景的考察

著 者 / 刘成斌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谢蕊芬 任晓霞

责任编辑 / 任晓霞 马甜甜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编辑部(010)59367159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3.75 字 数：336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699 - 2

定 价 / 9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文库总序

在中国恢复、重建社会学学科的历程中，华中科技大学是最早参与的高校之一，也是当年的理工科高校中唯一参与恢复、重建社会学的高校。如今，华中科技大学（原为华中工学院，曾更名为华中理工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已逐步走向成熟，走在中国高校社会学院系发展的前列。

30 多年前，能在一个理工科的高校建立社会学学科，源于教育家、华中工学院老院长朱九思先生的远见卓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初建时期。1980 年，在费孝通先生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在北京举办第一届社会学讲习班，朱九思院长决定选派余荣珮、刘洪安等 10 位同志去北京参加讲习班学习，并接见这 10 位同志，明确学校将建立社会学学科，勉励大家在讲习班好好学习，回来后担起建立社会学学科的重任。这是华中科技大学恢复、重建社会学的开端。这一年，在老前辈社会学者刘绪贻先生、艾玮生先生的指导和领导下，在朱九思院长的大力支持下，湖北省社会学会成立。余荣珮带领华中工学院的教师参与了湖北省社会学会的筹备工作，参加了湖北地区社会学界的许多会议和活动。华中工学院是湖北省社会学会的重要成员单位。

参加北京社会学讲习班的 10 位同志学习结束之后，朱九思院长听取了他们汇报学习情况，对开展社会学学科建设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1981 年，华中工学院成立了社会学研究室，归属当时的马列课部。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华中工学院，1982 年元旦之后我去学校报到，被分配到社会学研究室。1983 年，在朱九思院长的支持下，在王康先生的筹划下，学校决定在社会学研究室的基

础上成立社会学研究所，聘请王康先生为所长、刘中庸任副所长。1985年，华中工学院决定在社会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社会学系，聘请王康先生为系主任、刘中庸任副系主任；并在当年招收第一届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同时招收了专科学生。1986年，华中工学院经申报获社会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成为最早拥有社会学学科硕士点的十个高校之一。1988年，华中理工大学获教育部批准招收社会学专业本科生，当年招收了第一届社会学专业本科生。至此，社会学有了基本的人才培养体系，有规模的科学研究也开展起来。1997年，华中理工大学成立了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同年，社会学系成为独立的系（即学校二级单位）建制；2016年5月，社会学系更名为社会学院。

在20世纪的20年里，华中科技大学不仅确立了社会学学科的地位，而且为中国社会学学科的恢复、重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81年，朱九思先生批准和筹备了两件事：一是在学校举办全国社会学讲习班；二是由学校承办中国社会学会成立大会。

由朱九思先生、王康先生亲自领导和组织，中国社会学会、华中工学院、湖北社会学会联合举办的全国社会学高级讲习班在1982年3月15日开学（讲习班至6月15日结束），上课地点是华中工学院西五楼一层的阶梯教室，授课专家有林南先生、刘融先生等6位美籍华裔教授，还有丁克全先生等，学员是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131人。数年间，这些学员中的许多人成为各省、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高校社会学系的负责人和学术骨干，有些还成为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在讲习班结束之后，华中工学院社会学研究室的教师依据授课专家提供的大纲和学员的笔记，整理、印刷了讲习班的全套讲义，共7本、近200万字，并寄至每一位讲习班的学员手中。在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初期，社会学的资料极端匮乏，这套讲义是国内最早印刷的社会学资料之一，更是内容最丰富、印刷量最大的社会学资料。之后，由朱九思院长批准，华中工学院出版社（以书代刊）出版了两期《社会学研究资料》，这也是中国社会学最早的正式出版物之一。

1982年4月，中国社会学学会成立暨第一届全国学术年会在华中工学院召开，开幕式在学校西边运动场举行。费孝通先生、雷洁琼先生亲临会议，来自全国的近200位学者出席会议，其中主要是中国社会学会研究会的老一辈学者、各高校社会学专业负责人、各省社科院负责人、各省社会学学会筹备负责人，全国社会学高级讲习班的全体学员列席了会议。会议期间，费孝通先生到高级讲习班为学员授课。

1999年，华中理工大学承办了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20周年纪念暨1999年学术年会，全国各高校社会学系的负责人、各省社科院社会学所的负责人、各省社会学学会的负责人大多参加了会议，特别是20年前参与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许多前辈参加了会议，到会学者近200人。会议期间，周济校长在学校招待所二号楼会见了王康先生，对王康先生应朱九思老院长之邀请来校兼职、数年领导学校社会学学科建设表示感谢。

21世纪以来，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进入了更为快速发展的时期。2000年，增设了社会工作本科专业并招生；2001年，获社会保障硕士点授予权并招生；2002年，成立社会保障研究所、人口研究所；2003年，建立应用心理学二级学科硕士点并招生；2005年，成立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2006年，获社会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授予权、社会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社会保障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2008年，社会学学科成为湖北省重点学科；2009年，获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点授予权；2010年，招收第一届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生；2011年，获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2013年，获民政部批准为国家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基地；2014年，成立城乡文化研究中心。教师队伍由保持多年的十几人逐渐增加，至今专任教师已有30多人。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历经了两三代人的努力奋斗，先后曾经在社会学室、所、系工作的同志近60位，老一辈的有刘中庸教授、余荣珮教授，次年长的有张碧辉教授、郭碧坚教授、王平教授，还有李少文、李振文、孟二玲、童铁山、吴中宇、陈恢忠、雷洪、范洪、朱玲怡等，他们是华中科技大学社会

学学科的创建者、引路人，是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的重大贡献者。我们没有忘记曾在社会学系工作、后调离的一些教师，有徐玮、黎民、王传友、朱新称、刘欣、赵孟营、风笑天、周长城、陈志霞等，他们在社会学系工作期间，都为社会学学科发展做出了贡献。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也有其所培养的学生们的贡献。在2005年社会学博士点的申报表中，有一栏要填写20项在校学生（第一作者）发表的代表性成果，当年填在此栏的20篇已发表论文，不仅全部都是现在的CSSCI期刊源的论文，还有4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7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更有发表在《中国人口科学》等学界公认的权威期刊上的论文。这个栏目的材料使许多评审专家对我系的学生培养打了满分，为获得博士点授予权做出了直接贡献。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发展的30多年，受惠、受恩于全国社会学界的鼎力支持和帮助。费孝通先生、雷洁琼先生亲临学校指导、授课；王康先生亲自领导组建社会学所、社会学系，领导学科建设数年；郑杭生先生、陆学艺先生多次到学校讲学、指导学科建设；美籍华人林南教授等一大批国外学者及宋林飞教授、李强教授等，都曾多次来讲学、访问；还有近百位国内外社会学专家曾来讲学、交流。特别是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创建的初期、幼年时期、艰难时期，老一辈社会学家、国内外社会学界的同仁给予了我们学科建设的巨大帮助，华中科技大学的社会学后辈永远心存感谢！永远不会忘怀！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在30多年中形成了优良的传统，这个传统的核心是低调奋进、不懈努力，即为了中国的社会学事业，无论条件、环境如何，无论自己的能力如何，都始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在一个理工科高校建立社会学学科，其“先天不足”是可想而知的，正是这种优良传统的支撑，使社会学学科逐步走向成熟、逐步壮大。“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文库”，包括目前年龄大些的教师对自己以往研究成果的汇集，但更多是教师们近年的研究成果。这套文库的编辑出版，既是对以往学科建设的回顾和

总结，更是目前学科建设的新开端，不仅体现了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的优良传统和成就，也预示着学科发挥优良传统将有更大的发展。

雷 洪

2016 年 5 月

自序：经验驱动与三农研究的方法论

农民工的相关研究在中国乃至国外的社会科学家当中都已经相当多，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我们发现一个悖论：农民工的研究非常繁荣，但农民工相关的问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日益增加，比如，农民工流动与家庭婚姻领域相关的离婚率、留守儿童等衍生性问题，还有农民工流动导致媒体普遍关注的农二代犯罪高发、多发问题，诸如此类的社会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当然，这与客观的社会发展趋势、社会形势的复杂性有直接的因果关联，但学术界的研究是否提出和分析、预测了这些问题呢？学术的相关研究成果是否已经深刻地解释了这些问题的产生逻辑与社会机制呢？可能答案并不是肯定的。答案不肯定的原因首先是与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有关。

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经验研究都要讲究方法，但目前学界对方法的重视往往集中在技术层面，对方法论的认知和讨论明显不足。对于不同研究方式和技术之间的比较与关联，在不少研究者的理解中是存在误解的，遗憾的是误解者本人认为不是误解，而是分歧，并且用这种分歧有意或无意地贬低不同方法的研究者。比如不少定性研究者批判定量的人“有数据无思想”“假数真算”等。但反过来定性研究并不容乐观，当下的田野研究中几乎每篇论文都有一个新奇的理论框架，给人“个案满地跑，框架满天飞”的感觉，正如赵鼎新所形容的“每天都有众多有时堪称怪异的研究项目和设想粉墨登场，在如此纷繁芜杂的学术混战中出奇制胜的诀窍是不断地推陈出新，推翻常规老论调，开创学术新边疆”（赵鼎新，2006：3）。这一点在当今社会学的重镇可能表现得并不比中国更好，“今日美国一般的社会学、政治学系，对学生们要求

的是首先建立所谓‘理论’或模式，然后才做经验研究，这种认识方法的结果之一是模式堆积如山，绝大多数十分庸俗”（黄宗智，2013）。这表明社会学看似繁荣，其实与规范学科的差距还相当大的社会事实。笔者禁不住思考：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经验研究中的方法到底是有什么“科班”要求，其“科学”要素能否向社会学同人羡慕的经济学等更为成熟的学科看齐？

科学研究都是从问题意识开始，即意识到有问题才能着手研究工作。但问题意识往往始于对社会现象的困惑不解，这时模糊的问题意识就产生了，但此时的问题还只是一个大小、领域性的“现象”“表现”。所以，问题意识的清晰化是一个从“现象”看出“问题”的过程，前者是混沌印象状态，后者是清晰的可叙状态。所谓“可叙”，是指通过文献的查阅、理性思考，借助已有研究的学术脉络，逐渐能够梳理出“现象”的一些“特征”、关键性因素或变量，并且试图从一定的视角加以解释。

问题意识形成的标志在于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出问题。问题的探讨与研究往往是从界定社会现象即研究对象开始的，“社会学家的第一步工作应该是从界定他所研究的事物，以使自己和他人知道他在研究什么。这是一切论证和检验最不可缺少的首要条件”（涂尔干，1995：50）。这一条件是否达到是可以检验的：可以通过一定的视角与方法，对所要研究的社会事实能够用具体的社会变量及其关系进行阐述、理解、说明，即形成命题性社会事实。如赵鼎新在研究国家的形成问题时，就把国家的形成这一抽象、模糊的社会现象具体化为七个命题（如中国虽历经更替，但相似的帝国政体得以延续；中国有世界几大文明中最为显著的强国家传统）；冯仕政在对南街村现象的研究中，则把模糊、抽象的“南街村之谜”这一问题具体为三个命题：南街村的经济增长效率如何，南街村的政治合法性是如何形成的，南街村的意识形态怎样发挥作用。

这种把抽象、模糊的领域或现象具体化为问题或命题（problem）的过程表明：任何一个社会现象，其问题包含的因素肯定是纵横交错的，但某一次或一项具体的研究只能抓住一条主线。如

果是按照向度来分类，研究问题可分为结构性问题（横向为主线）与过程性问题（纵向为主线）。前者一般要采用量化的研究方法，后者一般要采用定性的田野调查方法。也许正是因为结构与过程两个向度的分野不清，导致很多人对定量与定性的关系持一种对立、互斥的看法。基于这种误解，有的人把方法批评变换成“情感指责”，甚至是人身攻击，这已经完全丧失科学的立场了。

从结构论的观点看，这里的社会事实应当确认为：“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或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作社会事实。”（涂尔干，1995：34）

根据涂尔干的说法，社会现象的“结晶”程度有高有低，结晶化程度高的社会现象就成为“固定”型的社会事实，比如国家法律、科层制组织形态等；结晶化程度低的社会现象就是“未固定”型的社会事实，如风俗文化、习惯伦理。但两种社会事实都具有超越个人表现的普遍性（“普遍存在于社会各处”）、独立于个人存在的外在性（“固有存在”）、对具体个人行动的制约性（“给予个人以约束”）的共同特征。

从建构论的观点看，社会事实应当是“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关涉到他人的行为，并且指向其过程的这种行动”。以他人指向为出发点，韦伯强调指向的时空可以是过去（如复仇）、现在（如防卫）、将来（如预防），但如果指向事物性对象（如冥想、打雨伞）就不属于社会行动，无意的行为后果（如交通事故）也不是社会行动（韦伯，2005：3、30—31）。由此，韦伯的“社会行动”概念与涂尔干的界定是相通的，即“他人指向”的意义理解应当满足普遍性（例如交通事故的证据应该让所有人都理解为“意外”，而不能换一些人就可以理解成有意为之，那样就是社会行动“谋杀”了）、外在性（行动发出之前的意念不算社会行动，行动一旦发出，便是一个“社会存在”，不是行动者可以消灭的，所以社会行动都有证据）、制约性（行动者都会考虑自己的行动发出对他人造成的影响）三要素。

因此，无论采用何种研究方式或技术，对社会事实的界定首先要考虑方法论层面的要求，无论是田野调查还是量化的调查问卷，在界定研究问题的方法论层面都应该考虑研究问题的普遍性、外在性、制约性等社会性。社会性要求超越主观预断，所以，涂尔干提出研究者观察社会事实首先“必须始终如一地摆脱一切预断”（涂尔干，1995：51）。

研究能否摆脱预断的标志就是把研究者所要研究的领域、个案、疑问等阐述成具体的问题或中立性命题，而不是用个人的臆断来提出所谓的理论框架然后再去“框定”、选择甚至有意修剪事实材料。比如关于中国农村治理问题，有的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理论框架，刻意回避那些与主观预定不一致的材料（歌颂新农村的只看政绩、批判新农村建设的只看斗争），选择那些虽不普遍但符合研究者意图的“事实”。当然，如果研究者没有受过“科班”的专业学术训练，这种用理论去“框”现实的过程也可能是由于其研究能力造成的，但不管框架主义者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其造成的结果都是导致实践的本来面目被遮掩，只发现“想发现”，或者是“应该发现”“准备发现”的现象，并且会称之为“田野调查”、实践经验，但其实这种框架主义往往会违反“事实”与经验，甚至让人们无法了解真实的经验常态。如征地拆迁问题中，“自焚”的以命抗争现象虽然频见报端，但这仍然不是拆迁的常态，政府采用拆迁之外的力量进行“变相强制”建构的“被自愿”才是大多数拆迁进程的常态。而由于大多数研究者只关注“新闻”价值或受舆论导向的影响，有“批评暴力强拆”的意图之后才去研究拆迁问题，这种有意或无意甚至是情绪化的“预断”必然导致研究者对“常态”的视而不见。

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亟待超越盆景意识和框架裁剪主义。以田野与实证为基础的定性研究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1990年代之前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很多成就。目前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日新月异，此种田野研究的方法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主流仍然是以访谈为主，即通过观察与访

谈获取资料，然后以定性的资料安排与分析来撰写研究论文。此类研究者在成功的人类学家当中大有人在，但在当前青年学者中，除了极少数的成功者之外，大多数遵循实地调查为基础的田野研究者常常处于两种困境：要么是在田野调查中看了白看，没有发现问题，当然也更写不出研究论文；要么是拿着自己读书时获得的理论框架像用剪刀裁剪盆景一样去裁剪经验材料。前一种困境是不进入状态，处于门外汉的境地；后一种状态就是“框剪主义”或叫“盆景主义”。处于前一种困境的青年学者或研究生会非常苦恼，往往由于毕业论文或工作科研任务的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入后一种困境中，结果就造成盆景主义的泛滥。

“个案满地跑，框架满天飞”是目前盆景主义泛滥的写照。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定性研究之所以受到追捧，似乎是由于定性研究介入比较容易，没有任何科学基础的人也可以直接参与田野调查，然后说自己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比如，农村研究者大多是从定性研究或者说是从田野调查开始的，遇到农村问题，似乎每个人都懂，都可以进行研究，好像没有任何研究条件的限制与约束。相比较而言，量化研究就需要先学会抽样、统计等专业技术，让大量的社会学或相关专业的人觉得“太难”了。其实不然，如果说量化研究以统计技术为必要条件，但具备这一必要条件的入门者往往可以进行中规中矩的“规范化”研究；而定性研究者则可能陷入前述的两种困境，“不进入状态的门外汉”和“看了白看”可归结为失败，不会有什么大的社会危害，但后者盆景主义方法论的盛行，其危害就不得不进行了。

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之所以会陷入盆景主义，原因众多，但最主要的因素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过于庞大、复杂，即“人类命运的道路，确实会使一个概览其某一片断的人不能不惊讶无比”（韦伯，2006：13）；另一方面是研究者的方法素养问题，比如有多少人在介入人类学研究之前，真正系统地学习了“科班”的人类学方法？前者是一个客观事实，它说明定性研究并不比定量研究容易，甚至更难。后者就是主观的态度问题了，所以韦伯奉劝那些“惊讶”者：“最好将他那些个人的微不足

道的意见隐藏不露，就像一个人在目睹汪洋大海或崇山峻岭时所做的那样。除非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有天赋将自己的意见用艺术或预言的形式表现出来。”（韦伯，2006：13）这里的表现即使在个人主义者那里只是材料的“组合”而非“建构”：“我们所做的只是对我们能够理解的个人行为类型进行界分，也就是提出并发展对它们类分——简而言之，就是把我们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加以使用的材料做一有序的安排。”（哈耶克，2003：102）笔者这里无法过多地涉及人类学培养过程和技术，但就方法论素养的应用来讲，定性研究最重要的是“理解”而非选择性建构。理解的含义是说，社会科学的研究不是对材料、经验冠以一般化的概念或框架，甚至是理论体系，而是要努力地去理解它们。

当然，辩证地来看，社会科学研究并不能完全回避“理论概念”的重要性与参照功能：从人们的思维方式来讲，现实是复杂的、多维的，也是纵横交错的，而概念可以让人们“化约”复杂、多维、交错的实践经验，这正如韦伯所提出的“理想类型”。有了理想类型的概念之化约，人们才能更好地描述、理解实践经验，也才能进行人与人之间的良好沟通，文化理解与理论传递也才成为可能。从哲学层面讲，人类思维活动本身就是对经验现实的“抽象”，抽象自然离不开“概念”。所以，我们要反对的倒不是一般性的以概念来理解性思考问题（也仅仅限于用来理解性思考），而是要反对随意提出描述性和分析性的概念来作为分析的工具。

好的学术研究是从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研究者的理论出发。违反这一点即从研究者提出的理论出发往往会导致框架裁剪主义的盆景“成果”，这好比是裁剪盆景的人首先有了一个盆景意识或想象，把树木、花草裁剪成盆景，而树木或花草的本来面目是未知的。

框架裁剪主义的盆景手法是形成“三农”研究纷繁芜杂面貌的根本原因。尤其是盆景的主刀者，陷入框剪主义而不自知，把研究“异类”于树木的本来面貌标称为研究创新，但其实是裁剪、歪曲了事实。基于此，盆景主义应当首先在方法认识上得到纠正：理解不是用框架或概念去“框剪”经验事实，也不是给予经验材

料一般化的标题（标签），而是用逻辑去理解经验。理论只是引导方向，理解产生知识的创造。

如果做个对比，框架裁剪主义与科学的理解解释之间存在以下七个方面的差别。一是从出发点来看，框架裁剪主义的出发点是理论框架，理解解释路线的出发点是社会事实的原材料。二是从理论态度来看，前者是搬用套用，后者是引导借鉴。三是从经验态度来看，前者是拿来主义，后者是尊重经验本身。四是从研究逻辑来看，前者是推理、想象并框进现实，后者是从事实材料出发归纳出社会关联。五是从价值角度来看，前者是应然的理性需求，后者是实然的呈现。六是从研究结论来看，前者是应用经验证实推想，后者是对经验的总结与提升。七是从学术价值来看，前者是按照研究者意志裁剪的盆景，后者是还原社会问题的森林图式。

经验研究中采用定性方法时并不是不需要理论，理论是必需的，这是无疑的。但在实践观察或经验研究中，理论只能作为观察实践、总结经验的“知识库存”而非教条。知识库存（储备）的含义是指：在看到一個具体的社会现象时，能够用相应的知识储备去理解现象，而不是把理论当作标准、框架去裁剪经验。前者形成的是阐释主义路线，后者形成的是“框架裁剪主义”。框架裁剪主义的本质方法论特征在于既定的人为建构。社会本来是一片森林，定性研究本来应该研究一棵具体的树，虽不全面，但可以让我们了解树木或花草的质地、属性、成长过程等。但框剪主义的定性研究是一个个盆景，即使再精致、再符合人们审美的需要，也毕竟是裁剪、割裂出来的，从加工过程的角度讲，是一种植物工艺品，而非科学应当努力追求的“真实森林”。即使通过大量的个案累加，也只能组成一个“人工花园”，而不可能呈现森林的真实面貌。“这种理论的按图索骥和‘田野调查’的最大收获，莫过于帮助研究与调查者们发现了他们本来就想要发现的东西”（吴毅，2007：25），“微观层面的信息，尤其是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平日的认识方法——从既有概念

到实证——颠倒过来”（吴毅，2007：174）。

在现实的经验研究中，框架裁剪主义流行的原因在于框架裁剪主义的教条套用过程简单易行：拿自己“所谓的看书”并背诵“书上是怎么教的”“我看了某某书上的是如何说的”，然后以此为真理、标准去“框”各种现象，凡是与此不符的，要么不予理睬，要么妄加批判、否定。研究者犯了教条主义错误、食古不化的错误却浑然不觉，并因此方法简单易行而乐此不疲，结果形成了五花八门却缺乏实质意义的“研究成果”，其更大的危害是造成后来的博士、硕士进行模仿，但对如何走上真正的学术研究道路之问题陷入“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格局。

实证性研究主要是回答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过程性问题，其基本任务在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其基本路线应该遵循阐释主义路线。阐释主义路线应该是要求“吃透”理论的精神，并用这种理论的精神去理解经验、社会事件，理解的功能应当表现为：遇到一个现象或问题时，可以用知识储备去回应、解释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逻辑。而框架裁剪路线的盆景主义是从既定的理念出发走向演绎，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出现以下方法论错误。

（1）学术概念是从教条中生搬硬套而来，拿理论教条去“发现”“修剪”经验材料，而不是尊重经验本身的实践形态。这主要体现研究态度的错误，颠倒了理论与经验在定性研究中本来应有的“知识库存”与“研究材料”的关系。

（2）理论概念之间缺乏体系性的有机衔接，而是四处搜索或尽可能罗列诸如区隔、符号抗争之类的名词进行拼凑，导致“理论”概念满天飞。不同时间、不同学派的理论或概念之间缺乏融合、整合，搞不清楚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导致概念杂陈。

（3）根据不同的理论概念寻找或裁剪不同的经验材料，会导致研究材料的“切割”，社会实践经验的本来面目会被人为随意地“修剪”，得到研究者“主观”有意想要或无意发现的“经验”。

（4）在知识生产环节中，盆景主义只能导致无效概念的积累，而不能真正促进知识的生产，无法形成有效的知识链。错误的盆景主义流行甚至会导致用想象出来的乌托邦主义代替现实或否认

现实，导致经验的无中生有。

(5) 就研究方法而言，盆景主义者最后即使积累到一定深度，能够对经验材料灵活组合，但由于脱离不了框架裁剪的路线，在研究手法上只能是变相抄袭。用诸如“半熟人”“准市场”一类的概念来提炼所谓“从经验出发”的研究结论。

“森林”式研究在方法上要求一个原始、自然、开放的系统性过程。原始是指从社会存在出发而不是从理念出发；自然是指不是人为地任意裁剪，而是依据社会本身的属性进行组合、排列；开放是指因素并不固定，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任何非既定的元素、因果关联。森林原则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即使只是呈现森林中的一棵树或者一片灌木丛，但都要求呈现“生态”过程而不是把它修剪成盆景。如此，田野调查与研究的积累才能达到森林的图景。

从科学性发展的目标来讲，实证科学研究的过程阐释既不能停留于“常识”，也不能走向神秘主义（研究者自认为是内行，其他人都是外行），而应走向规范的研究程序，让进入实证研究的人有“科班”规范程序可遵循。当然，“任何研究方法的作用都是有边界的”（孙立平，2002），不同研究方法既没有好坏之分，也没有在具体研究中的应用层面的对立，相反是可以互补的。

基于以上方法论的立场，本研究采取经验驱动的研究路线，以采用定量研究技术为主，辅以定性的人类学观察与访谈，尊重经验事实，分析社会逻辑，形成科学结论。